

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二元论的演变及其透析

叶 超¹, 蔡运龙²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46;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地理学是一门追求普适性的学科, 还是强调其独特性, 这个“普适”与“例外”的问题曾引起地理学史上最大的方法论争论。它反映出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的二元论。系统地理学家强调地理学追求一般法则, 区域学派则认为研究独特的区域是地理学的核心。这种二元论争论在古希腊时代就初见端倪, “舍费尔—哈特向之争”则使其达到顶点。对争论的历史根源和发展演变分析表明: 虽然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向和舍费尔都至少在形式上反对只强调系统和区域中的一个而忽视另一个的做法, 但是他们的兴趣、价值观导致的偏好和地理学史观的重大分歧, 使他们最终对区域地理和系统地理的倾向不一样。20 世纪 80 年代的“哈特—格里奇之争”只是这种二元论的一个余波。其后, 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兴起使得这种二元论争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后现代地理学聚焦于“批判的区域研究”, 实质上仍是这种争论在新时代的变种。中国地理学界缺乏此种争论, 原因可能在于“实用主义”的学术导向、学术环境、学术评价体制、折中调和的理论构建方式等。这不利于中国地理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关键词: 区域地理学; 系统地理学; 二元论; 舍费尔—哈特向之争; 哈特—格里奇之争

文章编号: 1000-0585(2012)05-0771-11

1 引言

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 地理学中存在着多种二元论, 比如自然与人文、描述与解释、科学与艺术、系统与区域等等^[1]。一般意义上的二元论意味着将本应统一的两者割裂来看, 或者只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在诸多二元论中, 地理学到底是一门“独特的”学科, 还是像其他学科那样追求“普遍的”法则? 这个所谓的“例外”与“普适”问题, 实际上是反映区域地理学与系统地理学关系的二元论。它曾引起地理学史上最大的方法论争论。“最大”, 系指争论的程度和影响而言。二战以前, 地理学并不是一个热衷方法论争论的学科。二战以后的初期阶段, 与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相比, 地理学方法论争论仍然欠缺。直到舍费尔(Fred Schaefer)于 1953 年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 方法论的检视》一文^[2], 挑起了“计量革命”派(实际上就是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学派的争论, 并持续了 10 多年, 到 1989 年还有专门的论文集总结这两派的争论^[3], 可见其影响程度。这一争论的更大意义在于改变了地理学界方法论研究沉寂的局面, 开风气之先^[4], 使得近 50 多年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成为方法论讨论最为热烈的一门学科。因此, 对于方法论讨论同样比较缺乏的我国学界而言, 深入理解并全面借鉴国外学界在方法论研究上的

收稿日期: 2011-08-21; 修订日期: 2011-12-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01092); 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2007FY140800); 江苏省优势学科资助

作者简介: 叶超(1978-), 男, 甘肃武威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地理学思想与方法。E-mail: yeover@163.com

丰富成果,是推进我国地理学界方法讨论和研究的必由之路^[5]。

就地理学方法论研究而言,既可以采取某个横断面进行剖析比较的案例研究,也可以通过纵向追溯历史的方法进行归纳^[5]。鉴于我国学界对区域与系统地理二元论的认识还很不全面,在方法论层面进行研讨的更是少见,因此,本文试图从方法论角度回顾和分析它发展演变的历史,并探讨其因果和启示。本文首先追溯这种二元论争论的历史根源,归纳其要点;接着聚焦于使争论趋于白热化的事件——“舍费尔—哈特向之争”(Schaefer-Hartshorne Debate,我们认为这一名词代表了两个学派的争论),分析并论述它的因由;然后提示该争论的余波,最后总结并阐发其意义。

2 二元论的历史根源

2.1 起始

区域地理学(或区域学派、地志学派)与系统地理学(或普通地理学,在二战后主要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或“计量革命”派)的二元论,其渊源可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希腊化时代。对于古希腊时代的地理学,赫特纳在回顾并总结地理学史时认为:对地球的整体描述或以数学的方法研究地球形成了一种流派(实际上就是系统地理学),它的代表人物是有“古代第一个地理学家”之称的、绘制了第一幅地球图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而以地方志、民族志和历史记叙为主的代表另一个流派(实际上就是区域地理学),它的代表人物是米利都的赫卡泰(Hecataeus of Miletus)^[6]。之后,由于仪器的不完善,地理学家“稍稍收敛了他们(在测量地球)方面的雄心”,使区域研究得到很大发展,经历了一个描述(区域)地理学的“黄金时代”^[7]。这说明,两种方法影响的此消彼长也取决于特定的时代和条件。

斯特拉波(Strabo)和托勒密(Ptolemy)分别是古罗马时代区域与系统地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斯特拉波非常强调区域研究,比如他指出:“在地理研究上,我们不仅要观察一个地方的形状和大小,而且要观察它们的互相联系……地理学家应当以已经测量过的整个地球的报道作为真理,并相信地理学家过去所相信的原理,首先测定我们所居住的土地(人类居住的全部区域)的面积、它的形状、自然特性和对它所有土地的关系,这就是地理学的特有对象”^[8]。通过这些论述以及斯特拉波所做的工作来看,他并不是一个主张严格划分系统与区域的二元论者,而是一个以区域地理为基调的地理学家。正如克拉瓦尔所评价“区域尺度的变化是他(斯特拉波)的方法论的核心”^[9]。《古代的地理学》的编者波德纳尔斯基也评论道:“斯特拉波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志学家……但他对于普遍地理学不是门外汉”^[8]。也就是说,斯特拉波虽更偏向区域地理,但他也积极提倡系统地理学。

相比之下,托勒密在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之间划分了一道严格的界线,并认为只有系统地理学才是“地理学”。比如,他主张:“地理学可以说是从数量方面来研究的……地理学完全不需要描述,因为它只用线条和符号来绘画地位和外形。因此,地方志根本不需要数学方法,可是数学方法在地理学中是最主要的部分”^[8]。在今天看来,这种比较绝对的态度和重数理轻描述的思想无疑是偏颇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勒密是区域与系统二元论的始作俑者。

2.2 瓦伦纽斯正式界定系统与区域地理学

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界定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是德国地理学家贝恩哈德·瓦伦纽斯(Bernhard Varenius)。他于1650年出版了《普通地理学》(Geographia Generalis),

书中论及当时学者热衷区域地理忽视系统地理而几乎使地理学丧失科学性的问题，被认为是“第一部企图把普通、数理及自然地理学与地方地理学结合在一起的著作”^[10]。对于区域与系统地理的关系，瓦伦纽斯认为：“地理学是混合数学的那一部分，它依靠数量，即形状、位置、大小、运动和天体现象等来解释地球及其各部分的状态。……普通地理学是研究整个地球的总的情况，并解释其各种性质，它不考虑各别的国家。但专门的或特殊地理学则单独地描述每一个国家的结构和位置；它也有两种：即描述范围广大地区的地方地理学，或说明地球的某个地方或一小片地段的小地区地理学”^[10]。由此可见，瓦伦纽斯不但正式界定了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而且非常强调数学方法在地理学中的应用。他认为普通地理学使得地理学具有“科学性”的观点与 300 年之后的舍费尔主张地理学应该追求普遍法则的主张基本一致，所以，瓦伦纽斯似乎是一个前现代时期地理学的“科学主义者”。然而，瓦伦纽斯也有论述日本的区域地理著作，虽然“采取区域描述的形式，成果不及他书中的地学通论令人印象深刻”^[9]，但至少表明他也重视区域地理学。

关于瓦伦纽斯提出的普通地理学与专门地理学的划分，何以演变成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这一问题，哈特向曾予以清楚地说明：

“瓦伦纽斯使用过的‘普通’和‘专门’地理学这些术语，以后成为欧洲地理学中关于这两个方面的标准术语，虽则以后许多作者对它们并不满意。德国作者在描述‘普通地理学’时频频使用‘Systematische’（系统）这个形容词，支持了该国通用的‘系统地理学’（Systematic geography）这个术语。‘专门地理学’这个术语在德国文献中大部分为‘Länderkunde’（区域地理学）所取代，此词虽有明显的缺陷，却比非德语的‘专门地理学’或如今在德国以外几乎已普遍使用的‘区域地理学’一语更为人所喜用。”^[11]

2.3 两种划分形成的不同传统

在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近代地理学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地理学已经形成并积淀了延续至今的多种传统。而引起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的“普适”与“例外”的大争论，实际上脱胎于古已有之的系统与区域二元论。归结起来，近代地理学形成之前，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的主要区别是：

（1）在研究对象上，系统地理学侧重于整个地球（甚至宇宙），而区域地理学侧重于国家、民族和各个地方。

（2）在研究方法上，系统地理学主要关心数学和几何方法的运用以及地图制作，而区域地理学主要是文学或艺术描述。

（3）在研究目的上，系统地理学侧重于“解释”或形成比较“普遍”的法则，而区域地理学则侧重于“描述”或研究单个区域的特性。

托勒密过分地强调系统地理而轻视区域地理是区域与系统二元论的诱因，瓦伦纽斯正式界定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则标志着这种二元论形成。虽然包括瓦伦纽斯在内的一些地理学家认为（或他们的著作表现出）系统和区域都是地理学两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研究方法，但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偏好，他们对这两者的侧重不一样；另一些地理学家，有的过于看重区域描述而忽视了系统研究的重要性，有的（如托勒密）则干脆否认了区域地理是“地理学”，这些极端观点为后来区域与系统二元论大争论埋下了种子。正如罗伯特·迪金森所指出：

“以托勒密和斯特拉波为一方、以康德和瓦伦纽斯为另一方的两类著作中着重点的差异，产生了在现代地理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这些不同的

方法,近来被人们分别叫做理论的(推论的)和经验的(描述的)方法。理论的方法是,寻求建立涉及到各地方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寻求建立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推论。经验的或会意的方法是,特别着重于通过陆地、海洋、区域及地方来描述那些国家和民族的特定的组合。它不寻求建立规律,但要找出现象在地方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地方的相互关系上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所有地理研究中两种基本的方法和传统;而且随着人们对地表知识的增加,它们的差异和冲突已变得越来越显著,越来越难于消弭和调和”^[10]。

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在研究方法与目的上的矛盾与分歧渐趋显著。“例外”与“普适”问题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舍费尔—哈特向之争”则是两者矛盾最为激化而大爆发的集中体现。

3 透析“舍费尔—哈特向之争”

3.1 哈特向与舍费尔都是形式上的一元论者

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的二元论,在历史时期就已埋下种子。但是,随着“统一”地理学认识的不断加强,类似于托勒密那样极端地强调其中的一元而否定另一元的观点逐渐站不住脚,因此,近代以后的地理学家大都至少在形式上是主张区域与系统并重的一元论者,这是在分析两个学派争论时首先应该予以注意的。

区域学派虽然强调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但是,他们同时也主张区域与系统地理学应该并重。比如,赫特纳认为系统和区域的二元论是历史的产物,偏废任何一者都是不足取的,“表明年代的或者历史的、区域的或者空间的考察,应具有与系统的或物的考察同等的地位”^[6]。在对待系统和区域二元论的态度上,哈特向与舍费尔基本一致。也就是,他们都赞同赫特纳对二元论的批判,主张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并重。

无论是出于对赫特纳的推崇,还是自身的严谨与深切感受,都使哈特向强烈反对系统与区域的二元论。比如,在早期著作《地理学的性质》中,他总结了系统地理与区域地理之间的差异,但更强调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并提出“地理学领域中两种方法都大有可为。专于一种方法的学者与用另一种方法工作的学者不应相轻”^[11]。在1958年的考据性论文中,他指出,“像其他学科一样,地理学关心一般概念、普遍原理和科学法则的发展和运用;像历史一样,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关注单个、独特事例的知识及其理解”^[12]。在1959年的专著中,他又一次强调,“‘系统的’或‘普通的’地理学和‘区域的’地理学这两个术语所表达的对比,并不是将地理学划分为两半;亦不是两个显著不同研究方法的对比,一个在某些研究中运用,另一个在另一些研究中运用。不管所研究地区的大小,我们是在分析一个在地区上作极其复杂方式变异着的极其复杂的现象统一体。为了把这个双重复杂性划分为可以控制的方式,在任何地理学研究中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并且交互地运用两个不同的分析方法——统一体的分片分析及地区的分段分析”^[13]。总体来看,哈特向自始至终都在反对系统和区域的二元论。

对于二元论产生的根源,哈特向与舍费尔都将之归为个人兴趣。哈特向特地引用一位地理学家的话来说明这种兴趣导致的方法论研究侧重点的取向应该互相包容:

“地理学领域中两种方法都大有可为。专于一种方法的学者与用另一种方法工作的学者不应相轻。正如克罗伯所说,‘方法之别,归根结底,可能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人兴趣之别’。进一步诠释此语,可以作出结论:把自己的兴趣局限于系统地理学的特殊方法或区

域地理学的综合方法，或者视情况而两者交替使用，都是完全合理的。但容忍的雅量实质上是可取的，确实也有利于理解：有利于 scientia（科学）”^[11]。

与哈特向相似的是，舍费尔也反对区域与系统二元论，并将其归因于个人兴趣。他认为区域与系统之争类似鸡与蛋何者先有的问题，实则没有必要，因为系统地理学建立的法则能应用于区域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同样能为系统地理学提供具体素材，所以它们实际上是并列的、互相联系却平等独立的学科；同时，他也指出争论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不同阶段地理学家的偏好（个人感情和心理因素）^[2]。这些观点与哈特向的“每一位学者都可按自己的兴趣对研究类型有所偏重”^[13]主张基本一致。

3.2 哈特向和舍费尔对区域和系统方法的兴趣与偏好有很大差异

虽然哈特向和舍费尔都反对只强调系统和区域中的一元而忽视另一个的做法，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导致的偏好却使他们在最终立场上对此二者的倾向不一样。甚至，这种倾向也决定了他们的方法论旨趣和立场。

3.2.1 哈特向对区域地理的偏好 哈特向虽然强烈反对二元论，但是，在具体对待二者关系时，他还是将区域地理作为地理学的基础、核心和最终目的。比如，他不但征引了赫特纳的观点“仅仅从事系统地理学工作而不培植区域地理学，这样的地理学家就会冒着完全脱离地理学基地的危险。不懂区域地理学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地理学家。单有一门区域地理学而没有系统地理学固然不完全，但毕竟还有地理性；系统地理学如果没有区域地理学，就不能履行地理学的完全职能，并且容易脱离地理学”^[11]；而且，将地理学最终归结为“描述和解释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各地方之间变异特性的科学”^[13]。

由此来看，赫特纳和哈特向都倾向于视区域地理为地理学的核心。如果再联系到哈特向认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基本上都倾向于地理学是一门“方志学”，他就为他的这种倾向找到了历史的根据。虽然哈特向抱怨《地理学性质》的许多批评者忽视了他对系统地理学的强调，但是，他对地理学性质的表述、他在叙述思想史时对“方志学”的重视以及他的兴趣最后反映出他还是将地理学的“重心”放在区域研究上。也就是说，虽然方法论的形式规则和目的要求使他必须拒斥二元论，但是，他的个人兴趣和思想史观的砝码却添加到区域地理学，由此在实质上导致他对地理学性质的认识仍然偏重于区域地理。

3.2.2 舍费尔对系统地理的偏好 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导引下，以洪堡作为追求科学法则的代表，而以康德作为“例外论”观点的代表，舍费尔借鉴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发展的实例，将寻求空间法则看做地理学的最终目的，认为“地理学必须注意地域现象的空间排列，而非现象本身；空间关系是地理学家的专门领域，非空间关系则是其他领域的专业”^[2]。在此基础上，舍费尔批判了区域学派将偏重应用的区域地理学视为地理学核心的观点，认为应用也是对法则的贯彻，而非研究独特的区域，因为：

“根本性的要点在于，只存在科学及科学的应用，而不存在‘纯’（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方法论之别。无论这种区别的根据是现实、个人兴趣还是研究重点。‘纯’科学家寻求的法则与他的‘应用’科学家同事所用的法则并无区别……应用（application）这个概念也不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清晰。它至少有两层意思：区域地理学家应用法则解释一些区域特征，而区域规划者或土壤保护专家则应用同样的法则工作，但他的应用含义与区域地理学家不同，他是一个社会工程师”^[2]。

3.3 哈特向和舍费尔的地理学史观存在重大分歧

3.3.1 哈特向的地理学史观 哈特向的地理学史观集中反映在他 1958 年发表的考证地理

学概念的文献中。在这篇经典论文中,哈特向追溯了从康德到赫特纳对地理学概念的认识,将这段历史分为6个阶段:1750年前、康德和洪堡时期(1756~1859)、19世纪前半期、19世纪后半期、赫特纳(1895~1927)、康德和洪堡概念的重新发现时期(1905~1939),最终得出了康德、洪堡和赫特纳关于地理学性质的观点基本一致的总结论^[12]。从这个划分来看,哈特向认为地理学史的演化系取决于学科自身以及地理学家们的塑造,他竭力寻找康德、洪堡、李特尔及赫特纳等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最后将之梳理成一条清晰的线索。所以,哈特向的地理学史观是“地理学(家)”本位的、寻求统一性的。这种地理学史观及其影响下的地理学方法论要义是:

“地理学家只有从学科本身固有的特征出发考察学科,才能得到更多的响应。而地理学的固有特性在于:它是世界上生活在相关区域的人们努力认知和理解现象之间联系的产物。与其说这些特性形成了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殊概念,倒不如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正确的概念建立基础的实际事实。接受概念当然不是地理工作的根本,但是对于那些希望理解学科本质和以之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的学者是有价值的。……特别是,早期时代以来的地理学家的工作不同于其他学科之处在于:因其特殊的研究主体,地理学家没有一个特定的客体或现象的分类体系,而是研究被整合在一个区域内的多数异质事物的事实;地理学不能被归入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某一类,也不是简单的在它们中间起桥梁作用,而是必须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12]。

由以上陈述可知,即使在舍费尔对他的方法论猛烈批判的情况下,哈特向仍然非常强调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区域,并愈发强调了从这种“学科特性”出发的重要性。从1939年到1959年这20年间哈特向所发表论著的主要内容看,他对地理学方法论的基本主张也并没有多少改变。1958年的这篇论文也许从另一层面验证了舍费尔批判的某种正确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舍费尔的批判以及在此过程中暴露的思想史知识的一些缺陷反而促使哈特向更加坚定了他的方法论信念。

3.3.2 舍费尔的地理学史观 与哈特向将康德视为确定地理学概念的第一人截然相反的是,舍费尔却认为康德是例外论的始作俑者。舍费尔认为,康德—赫特纳—哈特向一脉相承,形成地理学“例外论”的历史链条,赫特纳不但没有跳出康德的圈子,而且以能与康德的地理学观点不谋而合而感到欣喜,他们的权威和巨大声望使“例外论”渐渐根深蒂固,它的哲学根源是强调独特性和历史决定作用的“历史主义”,这使地理学遭到了“非科学,甚至反科学思想的入侵”(比如“来自独特性的典型的浪漫论调,大量整体论的关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陈词滥调,与地理学的特殊综合功能有关的谬断,严肃、客观的标准科学方法甚至遭到了研究者要求诉诸直觉和艺术情感的挑战等”)^[2]。所以,舍费尔的地理学史观是“(整体)科学”本位的,认为地理学史存在重大歧异而非统一的主题,这与哈特向和区域学派的观点完全相悖。现在来看,舍费尔显然是“科学主义”的坚定拥护者,而之后地理学的实际发展历史否定了他这种极端的“科学主义”的论调(比如人文主义地理学)。

因此,这场争论产生的另一主要原因在于两种看待地理学思想史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舍费尔的视角从当时地理学的现状和其他科学发展的趋势出发,对历史主要持批判态度,将对法则的追求视作科学的核心和目的,然后将地理学视为一门与其他学科一样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而哈特向的视角则是以忠实于学科的历史特性为出发点,对历史(尤其是他所认可的方向)主要持肯定态度,认为学科历史是基本统一的,继承这种历史特性就是维

护地理学的基本性质，并认为这就是地理学家努力的方向。

综合来看，可以说是不同的价值观（个人兴趣、偏好和目的）和历史观决定了方法论的差异。

4 争论的余波

随着“计量革命”浪潮的兴起，区域学派逐渐失去声势。然而，强调系统思想和方法的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地位也并不牢固。20 世纪 70 年代后，地理学又涌现了激进主义、人文主义、行为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潮流。实证主义地理学几乎有了与上世纪 60 年代的区域学派一样的遭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地理学界又出现了一些复兴“区域地理学”的呼声。具有代表性的是三篇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致辞^[14~16]。其中，哈特（John Hart，1979 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地理学家艺术的最高形式》一文，更是引起了他与格里奇（Reginald Golledge，1999 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代表的实证主义派的争论。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争论某种意义上与哈特向和舍费尔所争论的内容有惊人的相似，但影响相对较小，可以说是区域与系统二元论争论的余波。

《地理学家艺术的最高形式》，系出自哈特 1981 年在洛杉矶召开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 77 次年会上的主席演说辞（Presidential address）。年会的主席演说辞由担任主席的地理学家在年会上进行报告，然后紧接着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简称 AAG 年刊）上发表，它往往代表着当时地理学家对地理学性质、范围和方法的一般阐释，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与其他大多数主席致辞不同的是，哈特的这篇致辞形成的论文引起了较大争议。哈特在此文中重申了地理学重在研究区域的传统观点，批判了“计量革命”中形成的“科学主义”（即“狭隘地认为唯有采用数学方法才正确、才‘科学’”的主张），认为“地理学不能为了过分地追求‘科学’而失去自己的生命……系统地理学提供了区域研究的一般理论，区域地理学则从实际中验证这种理论基础，区域的思想是综合地理学不同分支的基本主题；地理学家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产生便于理解和评价区域的、生动的描述……一个地理学家应当尊重其他地理学家的哲学立场、价值观和信仰，避免强迫他人；地理学和地理学家应该更加宽容，而不是强制和抱有门户之见”^[14]。

哈特此文发表后不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以格里奇为首的 10 位地理学家，在 AAG 年刊上发表了一篇对该文的评论文章，他们严厉指责哈特此文会“使地理学退回 30 年前非科学的黑暗时期……使地理学成为一门不入流的高中课程，而不是强有力的大学课程”，并表示不同意哈特对地理学中运用分析模型、数学方法等科学方法的“攻击”^[17]。哈特回复了这个评论，认为格里奇等误解了他的论文：他只是对地理学中极端的“科学主义”的批评，并非对地理学采用科学方法的批评^[18]。其他地理学家（如 Healey）也从不同角度评论了哈特的论文以及它引起的争论^[19]。如果将哈特对“科学”与地理学关系的看法与哈特向的看法相对照，就会发现，哈特等地理学家的主张实际上只是哈特向方法论主张的一个侧面响应和些许的深化，格里奇等人的主张在舍费尔那里也能找到理论源泉。约翰斯顿曾深刻揭示了两之间争论的认识论根源：

“数学模型只是一种描述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而已，在学术的分工中并不具有优势

地位……模型在简化和联系,以及理解和改变现实世界方面仍有作用……‘普适性’不是地理学家追求的唯一科学目标,模型是辨明那些重要的模式、关系和趋势的重要工具,它不是‘无用的、邪恶的或者反演化的’,而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或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理论的涵义在过去十多年已经改变。对于那些60年代、70年代首先使用它的人来说,它是一整套相关联的陈述(法则或约束条件),它是解释和推演可检验的假设的基础;这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完全一致。但是对那些采用其他认识论立场(比如实在论)的地理学家而言,它是为理解现实而建构的抽象的思维框架,尽管在一些例子中抽象理论存在着像实证主义一样令人担忧的问题。理论仍在统治——但已不可同日而语”^[20]。

相比以往的区域与系统二元论争论,哈特此文及其引发的争议影响程度要小很多,它在实质上或许只是“舍费尔—哈特向之争”的余波,是区域与系统二元论争论的尾声。这种争论也许仍将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还未完全展开就已停歇的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无论是论辩的双方还是观众,似乎都开始怀疑简单地、反复比较“鸡与蛋”重要性而争论的意义,并感到厌倦。尽管如此,争论的内容与争论本身还是投射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命题,比如地理学家的主观与研究对象的“客观”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地理学史也并非纯然的“客观”史实,本身就掺杂了个人理解和喜好等主观成分(这也许并非一个“弊病”,而是其生动有趣之处!)等等。在地理学中,对“主观”与“客观”的涵义、意义与关系问题的反思和讨论,并不会随着一种理论的陈旧而过时^[21]。

区域与系统二元论争论逐渐消沉的另一原因是多元主义方法论在地理研究中的兴起。一方面,受到整体科学(哲学)从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22]转向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方法论^[23]的影响,地理学者开始注意到因价值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地理学思想,方法论的选择实际上是“政治的、个人的和偶然的”,所以应该采取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立场^[24];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地理学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从理论及通则性模式撤退,导致区域研究兴趣的再兴”^[9],但是此“区域”并非传统的区域,而是如索加(Edward Soja)所说的“批判的区域研究”^[25],它是空间、文本、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的社会理论、女性主义、地方性等诸多思想的杂糅^[26],颇有“系统”思维下区域研究的意味。所以,这并非意味着区域地理学又成为主流,而是反映了多元交汇的复杂研究态势。总体来看,后现代地理学进一步强调了不同的认识论都有其价值的事实,这不仅打破了系统与区域的二元对立,使其不再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话题,而且还推动地理学走向多元主义。

5 结论与讨论

地理学中“例外”与“普适”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区域与系统的二元论。这一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哈特向为代表的区域学派和舍费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地理学之间的大争论是两者矛盾激化的顶峰。

虽然哈特向和舍费尔都反对只强调系统和区域中的一元而忽视另一个的做法,但是,具体来看,两人对区域和系统方法的兴趣和价值偏向、地理学史观完全不同。舍费尔从整体科学发展的趋势出发,对历史主要持批判态度,将对法则的追求视作科学的核心和目的,然后将地理学视为一门与其他学科一样追求普遍法则的科学;而哈特向则是以忠实于学科的历史特性为出发点,对历史主要持肯定态度,认为发掘和继承这种历史特性就是维

护地理学的统一性，并认为这就是地理学家努力的方向。因此，他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兴趣和价值观导致的偏好以及历史观导致他们对区域地理和系统地理的实际倾向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他们最终在地理学性质和发展取向问题上的分歧。

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差异不但是地理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二战以后西方地理学理论演变的主要动力。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西方地理学界理论“革命”频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潮流交叠。导致这些剧烈变化的根本原因，正如约翰斯顿所指出，在于传统地理学者关注的是“地理学是什么？”，而二战以后的地理学者们则更多地考虑“地理学应该是什么？”^[27]。“应该”一词表明了价值判断对现当代地理学的重要性。实际上，通过分析区域与系统二元论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传统地理学者对地理学性质和重点的界定也受其偏好和价值观左右，其认识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价值观的嬗变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对地理学家提出了更为切实的要求，也使地理学更多地面向现实和未来，而不是沉浸和滞留于传统。从历史来看，尤其从区域与系统二元论争论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点更加明显：任何经典都会成为传统，这种传统甚至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但也面临着被后人遗忘的命运。一种优秀的传统也许会在某时某地重新复归，但它绝不会原封不动地在出现在后来者的认识诉求当中。任何传统的复兴都包含着时代命题，并在它的激发和制约下进行。所以，当区域与系统二元论的方法论探讨从孰轻孰重的较浅层次中摆脱出来，而切入到较深层面的论辩双方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时，这一老话题就有了进行新解释的必要，从而也被延伸和赋予了新的意义。

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地理学界缺乏这种学术史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和争论^[5,28]。民国时期，地质、地理学家丁文江与哲学家张君勱曾展开了“科学与玄学”之争，吸引了诸多名人参与，影响深远^[29]。其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与区域与系统二元论相关。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学术视野已远超昔日，学界却对涉及地理学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的争论非常淡漠。白光润在 1995 年发表的旨在批判中国地理学哲学贫困的文章^[30]，却仿佛成为此后地理学发展状况的预言。其中的原因或许已经被一些中外学者觉察到：“实用主义”的思想理路使得中国地理学者忙于应用性或政策导向性的研究，而缺乏对现实的批判^[31~34]。此外，学术环境、学术评价体制、中国地理学者对区域和系统思想的折中调和等也是可能的原因。

对中国地理学而言，这场争论折射出哲学和方法论思考和讨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哲学理论抽象与脚踏实地工作始终是地理学的两个支柱，不可偏废。正如法国地理学思想史家保罗·佩迪什所指出，“地理考察和哲学是哺育希腊地理学成长的两位‘奶母’”^[7]。这实际上也是符合整个地理学发展史的一种认识。对学科发展缺乏广泛、深刻、彻底的哲学反思，正是中国地理学的一块短板，也是中国“学术地理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透彻理解西方地理学哲学与方法论争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外地理学发展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结一些一般性和特殊性，是中国地理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路径。深入开展地理学哲学和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无论对过往与当下中国地理学的总结反思，还是对未来学科发展的前瞻筹划而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且迫在眉睫的事情。

参考文献:

- [1] 杰弗里·马丁. 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学思想史(第4版). 成一农, 王雪梅,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09~610.
- [2] Schaefer F.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53, 43(3): 226~249.
- [3] Entrikin J N, Brunn S D. Reflections on Richard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Washington D. C.: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9.
- [4] 马润潮. 西方经济地理学之演变及海峡两岸地理学者应有的认识. *地理研究*, 2004, 23(5): 574.
- [5] 叶超, 蔡运龙. 地理学方法论变革的案例剖析——重新审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之争. *地理学报*, 2009, 64(9): 1134~1142.
- [6] 赫特纳. 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 王兰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4~16, 135~136.
- [7] 保罗·佩迪什. 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 蔡宗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1.
- [8] 波德纳尔斯基. 古代的地理学. 梁昭锡,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68, 372~373.
- [9] 保罗·克拉瓦尔. 地理学思想史. 郑胜华, 刘德美,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1, 45, 187~198.
- [10] 罗伯特·迪金森. 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人. 葛以德, 林尔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1~13, 16.
- [11] 理查德·哈特向. 地理学的性质. 叶光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6, 574~575.
- [12] Hartshorne R. 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s a science of space, from Kant and Humboldt to Hettn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58, 48(2): 108, 97~108.
- [13] 理查德·哈特向. 地理学性质的透视. 黎樵,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48, 143, 163.
- [14] Hart J.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geographer's ar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2, 72(1): 1, 6.
- [15] Abler R. What shall we say? To whom shall we speak?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7, 77(4): 511~524.
- [16] Lewis P. Beyond descrip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5, 75(4): 465~478.
- [17] Golledge R, Church R, Dozier J, *et al.* Commentary on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geographer's ar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2, 72(4): 557~558.
- [18] Hart J. Comment in repl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2, 72(4): 559.
- [19] Healey R. Regional geography in the computer age: A further comment on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geographer's ar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3, 73(3): 439~441.
- [20] Johnston R. Order in space: geography as a discipline in distance. In: Johnston R, Williams M. *A Century of British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1.
- [21] 叶超, 蔡运龙. 地理学方法论演变与价值判断. *地理研究*, 2010, 29(5): 947~958.
- [22]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3] 法伊尔阿本德. 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纲要. 周昌忠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24] Tickell A, Sheppard E, Peck J, *et al.* *Politics and Practice in Economic Geography*. New York: Sage, 2007.
- [25] 爱德华·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 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87.
- [26] 大卫·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7] 约翰斯顿.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 唐晓峰, 李平,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74.
- [28] 汤茂林.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多样化问题. *地理研究*, 2009, 28(4): 865~882.
- [29] 白光润. 地理学的哲学贫困. *地理学报*, 1995, 50(3): 279~287.
- [30] 费侠莉. 丁文江: 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丁子霖, 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31] 刘云刚, 许学强. 中国地理学的二元结构. *地理科学*, 2008, 28(5): 587~593.
- [32] 刘云刚, 许学强. 实用主义 VS 科学主义: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取向. *地理研究*, 2010, 29(11): 2059~2069.
- [33] 埃里克·谢泼德, 特雷弗·巴恩斯. 《经济地理学指南》中文版序. 汤茂林, 谈静华, 李江涛,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4.
- [34] 蔡运龙, 陆大道, 周一星, 等. 地理科学的中国进展与国际趋势. *地理学报*, 2004, 59(6): 803~810.

Causes and effects of dualism between regional geography and systematic geography

YE Chao¹, CAI Yun-long²

(1. Colleg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one of the most excited methodological debates is the dualism between regional geography and systematic geography. It reflects different viewpoints among different geographers about the natur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The systematic geographers stress that geography is a science pursuing the general rules, but the regional geographers regard region as the centre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There are some persistent debates on this kind of dualism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Schaefer-Hartshorne Debate displays the conflicts between regional geography and systematic geography reach the peak. Although Schaefer and Hartshorne formally oppose the kind of dualism that only underlines one, but ignores the other, the different preferences caused by their interest, values and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finally lead to the real dualism. By contrast, the influences of Hart-Gollledge Debate are smaller, and it is like an epilogue. Thereafter, with the rise of the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nd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dualism between regional geography and systematic geography becomes more unimportant than ever. The history of the dualism shows value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course of defining what geography i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begin to hold a kind of standpoint admitting the different values have their rationality and logic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t becomes a common consensus on popular trends and general rule, especi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possible reasons why these debates in Chinese geography are hard to be found are: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pragmatism that lay particular stress on thos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hat can be quickly applied to solve the 'practical' issues, the speci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the academic evaluated system, and the eclectic attitudes to connecting regional geography to systematic geography.

Key words: regional geography; systematic geography; dualism; Schaefer-Hartshorne Debate; Hart-Gollledge Debate